中西交叉的创新研究更容易获得学术话语权。

三、我国社会学学术创新和话语权建构的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① 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和获得话语权的不二法门。新中国建立 60 多年,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国有大量的民生治国、经济社会建设方面的经验,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着力点,对此学者们也做过艰苦的努力。但是由于不少社会科学研究恢复重建较晚,一些学科内还没有形成科学严格的学术交流和评价制度,有的研究者追求短平快(这与我国的学术生态有关),于是出现大量低水平重复研究。社会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转型发展中的重大社会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研究成果高度碎片化。② 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以世所未见的、我国宏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复杂的经济社会转型为对象,沉下心来、吹沙见金,形成既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人民福祉服务、又能获得国际同行承认、具有一定话语权的创新成果。

学术创新和话语权建设需要一定的能力。延续上面的举例性讨论,如果选择我国社会学学术走出去并获得话语能力策略的话,笔者同意某些学者的看法:关键是基于中国实践,找到边缘性或共同性的话语,进入到社会学共同体的话语体系中,通过深入的创新性研究,使研究成果以对话的方式走出去。③ 就是说,要寻找一些能反映重大的社会实践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边缘性共同话语,下足力气,就能够在学术创新和话语能力建设方面获得成效。学术创新和话语权建构是学者的责任,但是,对学者的学术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评价制度在学术创新和话语权建构中的作用也必须予以关注。所以,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稳定的、促进学术实质性创新的制度,保障和支持学术创新。当然,如果我们在国际上有更高的经济和文化位势,学术创新和话语权获得的成效就更大一些。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问题与路径

郭 建 如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 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

摘　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长期的梦想与目标,当前已成为国家建设的急切需求。构建世界公认并对世界学术体系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体系的困难,在于世界学术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及学科拥有的圈层结构,建议以渐进方式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以世界共享的学科术语与知识体系为基础,从中国独特而丰富的“事实”出发,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提出分析性的概念、可检验的命题和新理论,最终在系统把握中国“事实”的同时,形成关于中国的系统性理论和相应学科。文章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还要重视激励机制的设计,防止逆向激励和逆向淘汰现象。

关键词:社会科学体系;中心—边缘结构;圈层结构;渐进方式;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2-0018-05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② 李友梅:《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若干思考》,《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③ 耿敬:《中国话语建设的问题》,载《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中国社会学派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研讨会精粹,探索与争鸣杂志 2016 年 10 月 24 日网上发布。

一、问题提出

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是我国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的梦想和奋斗目标。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浓厚的实践倾向,社会科学的引入是为了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最终为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从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中国化的努力。但为什么国家近些年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非常重视呢?

概括起来,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全球市场上占有重要分量,但我国在全球话语体系上并没有相应分量,“有理说不出,说了也传不远”;二是因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产生了大量丰富且独特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需要对这些“事实”进行理论总结,对面临的问题和正在进行的以及未来的改革进行理论指导,为国家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加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然而社会科学的理论供给是明显不足的。第三,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上哲学社会科学大国,拥有庞大的社会科学队伍以及庞大的科研投入,但对国际学术体系、学术话语的影响很小。这三大反差使得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显得非常迫切。

二、结构屏障

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引入中国多数已有百年历史,但为什么“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还没有引起世界的足够重视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学术话语的改变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中国的大学和学科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和学科学术话语自身的结构,可能是需要引起重视的两大屏障。

(一)中心与边缘结构

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长期处在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的结构中。这种中心与边缘的结构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也存在文化,包括高等教育的领域中。美国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曾对世界高等教育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大学建制来自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除拥有语言(英语)的天然优势外,还有着长久的学术积累、许多一流大学、众多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和雄厚的科研经费,在多方面形成了优势,确立了学术话语权。① 这种结构在演变过程中还会呈现路径依赖与正反馈效应,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要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还要其他国家的大学及科研人员承认,就需要改变支配性的结构关系。

我国自然科学在国家持续的高投入下,北大、清华为代表的部分“985”院校已有不少学科进入到世界的百分之一,有的甚至进入到千分之一,还有个别学科的指标位居国际第一。假以时日,我国自然科学学科、工程学科在国际标准下进入国际学科前沿是可期待的。相对来讲,社会科学就要难得多。自然科学追求的是普遍规律,而社会科学更多是研究所在国的社会现象、问题和规律,受所在国社会本身的影响较大。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能否在国际学术界享有重要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影响力及该国学术界在该社会研究上的理论创新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

(二)学科学术话语的圈层结构

学科的学术话语构成是有层次的,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的学术话语可根据学术性强弱分为三个层次:处于内核的是学科的基本术语、基本概念以及最基本的假设与判断等构成的基础构架,具有更大范围或不同社会的适用性。学科之间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所用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基本的价值与判断上的差异,也就是学科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对人类行为或社会构成及运行方式的假设上的基本差异。如果不认同该学科最基本的概念术语、基本命题和假设,不使用这些学科语言去表达和进行学科思维,就很难被该学科所认同。紧挨着内核的第二个圈层,由本学科在主要研究领域

① 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7—30 页。

发展出来的基本理论和相关的经典研究所构成,这些理论和相应的经典论述是针对具体社会现象或具体社会领域的问题,相关领域知识的系统化是在大量的案例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逐渐积累而成的,如社会学的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等主要研究领域,既有特有的议题、理论论述,也都有与之相关的一大批经典学术研究。第三层次则是虽有一定学科意识但更多是对经验的抽象和概括,以及针对某些现实问题基于理论推演或实证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等。

这三个层次构成了一个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由外到内,三个圈层的抽象程度和概括力越来越强;由内而外,抽象程度逐渐减弱,实践性则越来越强,三个圈层循环发展,相互支撑。类似库恩所揭示的科学范式①,就学科的辐射与防护能力而言,实践层次的防护能力是最弱的,会受到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和不断出现的新"事实"的检验和挑战,核心层次的防护能力是最强的,因此是最稳定和最难突破的。

在社会科学中,还有些学科是建立在对基础学科在特定现实领域进行的研究所积累的知识的系统化或集成的基础上。这些基础学科的应用性分支或集成性学科并没有形成严格的话语圈层结构,可能会呈现出更强的国别性特点,因此这些学科突破已有的中心—边缘结构,从边缘逆袭入中心可能更有潜力。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基础学科本身的基础理论进展缓慢,问题取向的实证性研究居于主导地位,学科发展主要体现在大量的应用研究上,这可能标志着某些基础学科的发展再次进入通过实证研究实现逐步积累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为各种源于局部社会的理论通过竞争进入基础学科的主流知识体系提供了契机。

三、路径选择

(一)社会科学的普适性与地方性

如何构建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呢?中国的社会科学与西方学术界占主导的世界社会科学是什么关系呢?是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分部或分支,或是建立完全独立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体系呢?这涉及学科的世界性与地方性、普世性与局部性的问题。两者虽然存在辩证关系,但现实中,还是有不少人习惯地将之对立起来,在强调与国际接轨时忽视本国特点,在强调民族性时又希望一切都从本民族的传统中生长出来。

实际上,大学可以说天生就是国际性的,以发展科学为己任的学科也是如此。社会科学的创立者不仅仅是想发现一地一域的规律,也希望这些规律能够具有推广性和普遍性,如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希望能够在比较不同社会的基础上,探寻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历史原因,学科奠基人以及对学科做出重大贡献的经典人物,主要来自于西方社会,因此国际上学科的学术话语,更多是建立在对西方社会发展的观察、研究和验证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是应该在国际性学科的第二圈层努力以产生本学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经典论述和著作,还是应该彻底抛弃西方的学科建构方式,摆脱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另起炉灶呢?

倘若选择后者,能够依靠的资源只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学之道,或者是计划体制下的学科传统,但这两个基础均有着根本缺陷: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的治学传统,可能只是对构建中国式的人文学科助益较大,对构建社会科学的贡献有限。计划体制下,一些社会学科被取消或成为批判对象,如社会学、政治学等等,有的社会学科虽存在,却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如经济学、法学、新闻学等,如果在浓厚的意识形态下发展相关学科,难免会把"政治宣传"和学科话语相混淆,容易陷入自说自话境地,或被误认为意识形态宣传。不为世界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就谈不上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目的,主要在于使中国的社会科学成为世界的社会科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由原来的"失语""失声"变成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主要声音,甚至能够掌握话语主动权。基于此,在构建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88页。

中国特色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时,该学科最基本的规范和学科标准应该是统一的,学科最基本的术语、概念、表述方式和思维方式应该被充分利用。

(二)渐进性的主张与建设路径

在保留学科共享的基础架构的情况下,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应采用渐进方式,当前应集中实现第二层的突破,即从筛选中国独特的事实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提炼出新的学术性概念,进而提出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新理论,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系统性的梳理中,发展出中国式的理论体系;通过对构成学科的基本概念、范畴以及学科的基本思维方式不断挑战,用基于中国的实践,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新概念丰富或替代源于西方的某些学科基本概念,最终实现对共享的核心圈层的知识的更新。具体来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需要特别强调:

首先是拥有丰富、独特且较为系统的中国"事实"。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许多独特的"事实",即便是在完成现代化、工业化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已实现的社会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条件、困难、机遇以及所采取的方式、引起的后果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一样。应该说,国内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独特性事实的发掘和筛选方面虽做了一定努力,但还远远不够。许多研究仅仅注意到与西方相符合的方面,没有有意识地关注与西方社会或西方的理论不一致的地方;还有些研究虽然关注到了这些独特性,但这种关注更多是零散的、非系统地,没有关注这些独特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丰富、独特和系统的社会事实,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出发点、基础和自信力的来源。

第二,以问题为导向,对中国独特性的事实给予创新性的理论解释,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关键所在。仅仅发现或拥有独特性的事实是不够的,还需要能够从"事实"中提炼出理论性问题或将独特性的现实问题转化成理论性问题,并针对这些事实和理论性问题提出有创新的分析性概念,形成新命题,并进一步发展成解释性理论。这是国内社会科学目前最薄弱的地方。许多学者只关注西方理论能够解释的部分,或者削足适履,生搬硬套西方概念和理论;或者仅仅停留在描述而非分析的层次上,没能够把中国的道理和逻辑讲出来。在理论形成中,提出分析性的概念是关键。如果能积累足够多的有解释力的基于中国事实的分析性概念,就有可能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

第三,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的系统化。在拥有大量独特的中国"事实"以及基于中国"事实"的实证研究提出的有创新性的分析性概念和新理论基础上,实现中国研究的系统化,覆盖学科的主要领域和主要议题,逐步实现主要社会科学学科的中国特色化。

第四,在进行学科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时,要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置于中心;在研究过程中秉持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但在问题的解决和提供政策方案时,要依据中国的价值和文化进行判断和选择,提供"中国方案",体现中国的世界观和价值理念。

(三)以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为例

许多基础学科围绕着教育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发展出了相应的分支学科,这些围绕着教育领域形成的分支学科或者是作为母学科的子学科,或者是根据知识间的关联程度集合而成教育学门类中的相应学科。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就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基础性的学科,围绕着高等教育管理问题逐渐发展起来的学科集合体,包括高等教育组织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政策学等,每个子集合都有从基础学科发展出来的基本理论、经典研究和相应的研究方法等。从国际视域看,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主要是一个研究领域,所谓的知识体系更多是该研究领域相关知识的一种系统化形式。尽管学界对该研究领域有哪些主要的研究议题,有哪些主要的基础学科,有哪些经典的研究著作有一些共识,但开设高等教育管理专业方向的高校各有自己的特点,有的偏重理论,有的偏重实践;有的集中在某些议题的研究上,有的则集中在某些基础学科在此领域的应用上。

将高等教育管理学看作是诸多基础学科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中子学科的集合,并不否认每个子集内存在着学科化问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

高等教育管理学科方向上,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基础学科,考虑到每个基础学科擅长的议题不同,着重梳理和发展社会学的组织与制度理论、政治学科的政策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运用,在课程设置上努力构建相关学科的关联,以此构成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基本架构,以覆盖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方面、主要过程、主要议题及主要的学科视角。在此学科构架下,相关学者还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独特“事实”,积极开展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如在研究“985”工程项目时提出理想导向的政策制定理论;有的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国大学历史上多次大规模举办科技企业的独特现象;有的研究注意到了大学院系师资队伍建设中的团队问题,关注到在中国情境下大学校长的社会资本与大学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还有些研究探讨了大学干部的选拔方式以及教代会与大学治理等问题。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体系,还是高校内部的管理与运行,都处在重大的调整和重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重要选择,如在高等教育体系上是选择单轨制还是双轨制;在高校外部治理上如何处理政府和高校间的关系,在高校内部治理上如何处理党委、行政团队、学者群体、学生群体间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和独特的实践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科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难得的机会。

四、激励设计

最近三十多年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交往频繁,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前依靠人员的断断续续往来以及时断时续的翻译获得国外社会科学发展信息的状况,在根本上得到了改变,国内学者对国外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了更充分和更及时的了解,这为我国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对国际社会科学产生影响力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要有效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还需要有效的激励。激励不足,甚至出现逆向激励和逆向淘汰,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重要阻力。

逆向激励与逆向淘汰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发表,二是科研项目申请。目前,大学的各种排名,包括政府的排名都对国外发表给予很高权重,这自然会鼓励学校或学科所在院系激励教师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国外期刊,尤其是社会科学期刊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主流,国外期刊关注的焦点、设定的议题,与中国改革与发展遇到的重大问题差异很大。国内重要的现实问题得不到国外期刊的关注,国外学术界对中国感兴趣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为了能够比较容易地在国外期刊上发表,忽视或放弃对中国重要问题的关注,主动被国外的所谓前沿、议题和理论话语牵着走。同样,科研项目也往往是学校学科排名的重要指标。近些年,国家对社会科学领域设置许多研究项目,投入大量经费。但政府部门和宣传部门往往也把很多操作性问题列成项目,甚至列为重大或重点项目,这些项目本身的学术性不强,可能会干扰到学科的学术性发展。

在对外文发表以及争取科研项目的强激励下,特别是与人才引进和职称晋升紧密相连时,那些在这两个方面不擅长但专注于中国重大问题深度研究的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就有可能面临着逆淘汰的结局。如何进行好的激励机制设计,鼓励更多的机构和科研人员扎根于中国现实,以问题为导向,努力理解中国,提出中国的理论,鼓励每个人长期积累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风格,鼓励每所高校,尤其是承担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重任的高校形成自己的研究传统、研究风格,甚至是学派,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代表作制度、项目后期资助都是比较有益的尝试;除此外,还应该进一步提高国内学术期刊的质量,鼓励国内重要的学术期刊同时发行英文版,以提升国内期刊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本栏责任编辑　　刘曙光)